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八編24

張文環及其日據時期 文學研究(下)

陳英仕·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八 編

第 24 冊

張文環及其日據時期文學研究（下）

陳英仕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張文環及其日據時期文學研究（下）／陳英仕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4+27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八編；第 24 冊）

ISBN 978-986-404-450-4（精裝）

1. 張文環 2. 臺灣文學 3. 文學評論 4. 日據時期

733.08

104015146

ISBN-978-986-404-450-4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八 編 第二四冊

ISBN：978-986-404-450-4

張文環及其日據時期文學研究（下）

作 者 陳英仕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496142 字

定 價 八編 29 冊（精裝）台幣 5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張文環及其日據時期文學研究(下)

陳英仕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相關研究成果	5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7
第二章 張文環之人生經歷	15
第一節 故鄉經驗期（1909～1927）	15
一、環境之影響	16
二、教育之啓蒙	22
第二節 負笈東京期（1927～1938）	29
一、留學背景	30
二、求學歷程	35
第三節 戰時體制期（1938～1945）	46
一、戰時社會	47
二、返臺生活	54
第四節 浴火重生期（1945～1978）	58
一、二二八之劫	58
二、未竟的臺灣人三部曲	63

第三章 張文環之文學原鄉、家庭生活與性情交遊	69
第一節 文學原鄉	69
一、大坪	69
二、梅仔坑	72
三、小結	82
第二節 家庭生活	83
一、張文環與二位夫人	84
二、張文環與五個子女	91
三、小結	102
第三節 性情與交遊	104
一、樂觀豪爽，妙語解頤	105
二、膽小懼高，聞酒色變	108
三、盡職負責，關愛部屬	111
四、重情好客，助人為善	114
五、創作嚴謹，獎掖後進	120
六、剛直堅毅，民族氣節	123
七、小結	126
第四章 張文環之文學活動	129
第一節 從臺灣人文化同好會到文聯東京支部	129
一、東京臺灣人文化同好會	131
二、臺灣藝術研究會	136
三、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	150
四、小結	158
第二節 《臺灣文學》與「厚生演劇研究會」	159
一、風雨飄搖的戰時文壇	159
二、張文環與《臺灣文學》	173
三、張文環與厚生演劇研究會	198
第五章 張文環旅日時期作品探究	213
第一節 初登文壇	214
一、未曾夢想的荊棘之道	214
二、語言思索	220
第二節 作品探究	224

一、〈落蕾〉	224
二、〈貞操〉	228
三、〈哭泣的女人〉	232
四、〈父親的要求〉	235
五、〈過重〉	258
六、〈部落的元老〉	267
七、〈豬的生產〉	272
八、總結：巔峰之前的練習曲	277

下 冊

第六章 張文環返臺後至光復前作品探究	285
第一節 作品探究	286
一、〈兩位新娘〉	286
二、《山茶花》	292
三、〈辣蕪饅子〉	318
四、〈憂鬱的詩人〉	323
五、〈藝妲之家〉	325
六、〈部落的慘劇〉	346
七、〈論語與雞〉	351
八、〈夜猴子〉	366
九、〈頓悟〉	376
十、〈闖雞〉	382
十一、〈地方生活〉	398
十二、〈迷失的孩子〉	407
十三、〈媳婦〉	413
十四、〈父親的送行〉	417
十五、〈戰爭〉	419
十六、〈土地的香味〉	421
十七、〈在雲中〉	428
十八、總結：質量俱佳的黃金期	431
第二節 文學奉公下的異聲	443
一、張文環與皇民奉公會	443
二、張文環受殖民當局青睞的原因	446

三、奉公活動與翼贊言說	449
四、同中存異的多音交響	456
五、小結	467
第七章 結 論	471
引用文獻	483
附錄一：呂赫若日記（1942～1944）所載與張文 環之互動、交遊及其參與《臺灣文學》 之記事摘要	495
附錄二：張良澤教授訪談錄	507
附錄三：張孝宗先生訪談錄	515
附錄四：張文環生平暨寫作年表（1909～978） ..	521
圖表目錄	
表一：《福爾摩沙》一至三期登載作品一覽表	144
表二：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臺灣小說集》乾坤 兩卷作家作品一覽表	172
表三：《臺灣文學》有限會社成員職稱一覽表	187
表四：〈父親的要求〉中的阿義與張文環現實生活 對照表	238
表五：日據時期漢書房與公學校及其學生數一覽 表（1902～1906；1919～1921）	354
表六：張文環家族與石有諒家族之對應關係表 ..	367

第六章 張文環返臺後至 光復前作品探究

張文環於旅日期間總共創作了八篇小說，由內容觀之，除了反映其帝都經驗的〈父之顏〉和〈父親的要求〉外，他在創作之初，即明確地替自己的文學路線定位，那就是以故鄉的人事為題材，描寫山村部落的眾生相，使他的作品一開始便散發著濃郁的鄉土氣息。而在主題思想上，舉凡婚戀問題、愛情問題、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張文環皆有所披露，並從中體現出殖民體制和封建陋習對人民的壓迫及束縛。然而，我們在張文環的小說裡，幾乎看不到他以作者之姿，跳出來為苦難時代下不幸的大眾發出不平之鳴，或以尖銳的批判言辭向殖民主及不公不義的社會提出抗議，而是藉由人物心理的生動刻劃、環境場面的細膩描寫，讓讀者的情緒能融入小說中，與裡面那些生活於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共享時代脈動，從而產生更深、更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如此客觀冷靜的敘述模式，便成了張文環小說貫用的手法和特色。

但張文環旅京期間的創作，雖努力於挖掘鄉土經驗與書寫地方人事，也嘗試各種人物形象的塑造，不過其返臺前所創作的最後兩篇小說〈部落的元老〉及〈豬的生產〉，較之先前的作品卻呈現主題不清、思想模糊的現象，且這種現象還延續到返臺後的第一篇創作〈兩個新娘〉上。究其主因，可說是張文環意圖拓展題材、表現不同風格所致，直到長篇力作《山茶花》的出現，才一掃陰霾，達到形式與內容完整的統一。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自己創作的困境與作品的缺失，張文環也有所意識。因此，尚處摸索題材、鍛鍊技巧、思考文學方向階段的張文環，遂於返臺前，特地拜訪了旅日期間對自己創作上啟發、勉勵甚多的日本左翼作家平林彪吾。張文環回憶道：

我就談一些臺灣鄉下的生活狀況讓他聽，松本先生聽後勉勵我加油，激勵我應再進一步努力才行。不過我是覺得不但是第一步、連第二步、三步都還是努力不夠。「不，你就照剛才講給我聽的一樣寫就好！」他的話就這樣不可思議地縈迴在我耳裡。（註1）

這段回憶文透露的是，張文環當時的苦惱並不在於素材的缺乏，而在於素材的統合、編列與掌控，以及該用何種手法或技巧來呈現。然平林的回答看似言簡意賅，毫無論解，但對張文環來說卻有如醍醐灌頂，令他茅塞頓開、受用不盡。依平林之意，他肯定張文環選擇故鄉書寫的路線，而表現的方法就是「自然」，像說故事般，先將手中素材充分剪裁和掌握，再依次娓娓道出，如訴己事，自能感動人心。換句話說，故鄉書寫的要點就在自然而不造作，不需太多的理論、修辭或技巧，只要將作者的所知所感次第鋪陳、如實描繪，便能達到最好的藝術效果。

平林的建議在張文環返臺後的創作中得到落實，這從《山茶花》、〈論語與雞〉、〈夜猴子〉、〈闖雞〉等多篇體現作者故鄉（梅山）經驗的膾炙人口小說便得印證，奠定了張文環在臺灣文壇獨樹一幟的風格和地位。本章所論內容，即一九三八年張文環離京返臺至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前發表在各刊物的小說和翼贊言論，藉以探究此一時期作家的書寫脈絡與文學歷程，及隱含在作品中的「言外之意」。

第一節 作品探究

一、〈兩位新娘〉

該篇小說是張文環一九三八年四月由日返臺後的首作，刊登於《風月報》上。就內容觀之，它在題材上與離日前最後發表的兩篇作品——〈部落的元老〉、〈豬的生產〉實有同質性，描寫的均是鄉間或部落的軼聞軼事，並以村翁、老嫗為主角，通過他們的日常生活與人際關係，透視殖民社會底下臺灣民眾的思想感情，以及糾結於內部的矛盾和衝突，因此這三篇小說可說是張文環返臺前試圖摸索文學路線、落實故鄉書寫的實驗之作。換句話說，〈兩位

（註1）張文環著，賴安譯：〈懷念平林彪吾〉，原載《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4月13日，收入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3月），卷6，頁51。

新娘〉的創作構思應於張文環返臺之前就已底定，但迫於斯時環境險峻，已無餘裕，故只好留待回臺再行完成。

〈兩位新娘〉通篇分作三小節，第一小節講述的是四十二三歲就當祖父的阿福伯睹物思人，看見亡妻生前最愛的石榴樹，回憶起昔日兩人常為該不該將它砍掉而爭執吵架的種種。如今陰陽兩隔，這棵曾讓他十分厭惡的石榴樹，現在卻反而成爲緬懷妻子的精神寄託——彷彿「鄉下姑娘」般的石榴花，「好像表現著妻樸素的性質似地，覺得可愛」〔註2〕。另一方面，擁有一雙子女的阿福伯，女兒已結婚生子，而剛從公學校畢業的兒子進發則在自家經營的金紙店幫忙生意，但正值青春期的進發免不了對異性產生好奇，遂開始與店裡的女工調情起來，這讓顧慮風評的阿福伯決定提早給兒子娶媳婦，於是在鄰村老人的介紹下談妥了親事。

第二小節則描寫進發結婚宴會的熱鬧場面，以及婚後所衍生出來的家庭紛爭。或許是受結婚喜慶氣氛的影響，即便婚禮結束，家中的空氣仍躁動著，不論是進發還是店裡的女工都因此未能專心工作，這讓看在眼裡的阿福伯感到憂心。與此同時，女工之間又流傳著公公對媳婦不滿的耳語，致使阿福伯一個洗臉盆掉落的舉動，引起媳婦以爲是對她不高興，才故意把臉盆的水潑出來的誤會，這讓公媳兩人的感情從此決裂，就連進發也不明究理地坦護妻子，使福伯失望不已。在旁人看來，阿福伯與兒媳失合的原因係新娘出轎的時間和雙親相沖所致，而他自己也認同此一說法。爲了解決厄運，阿福伯遂在他人的勸說下找上盲眼的卜卦師阿順，並依其指示，於近郊的三叉路口挖了三個洞，分別埋下裝有自己及兒媳三人出生年月的小壺。但福伯的做法卻因破壞道路建設而遭人舉發，不僅在派出所被警察打紅了雙頰，還被以妨害交通的罪名罰金。

第三小節寫身心受創的阿福伯不甘自己孤守鰥夫生活，賺錢照顧兒子卻換來今日淒慘的遭遇，於是他決心再婚。就在媒人的介紹下，阿福伯像做夢般的娶了鄰村一位三十初頭的小姐，她是街上公學校的畢業生，算得上智識階級的女性。尤令阿福伯驚喜的是——「而且，是處女。咦！我該怎麼講，像我這種年齡，卻真的要娶一個處女？」〔註3〕有了媒人的促成，親事進行的

〔註2〕張文環著，陳千武譯：〈兩位新娘〉，原載《風月報》第74期，1938年10月，收入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1，頁152。

〔註3〕同註2，頁162。

很順利，阿福伯如願地迎娶了新婚妻子，也不再考慮別人的閒話，過著屬於自己的幸福日子。以上，是〈兩位新娘〉的情節梗概。

其次，我們要探討的是小說中所呈現的社會圖譜及思想意涵。

（一）隱含於風俗描寫下的批判意識

發端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的臺灣新文化運動，由於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標榜「民主」、「科學」精神的影響，使臺灣知識分子也開始對傳統封建陋習和不合時宜的民俗活動進行反省和批判。這從臺灣新文學早期的作品，如賴和的〈鬥鬧熱〉、〈赴會〉、〈歸家〉、〈蛇先生〉以及龍瑛宗的〈黃家〉、朱點人的〈蟬〉等小說和登載於《臺灣民報》上具有理性、進步觀念的社論，便可看出時下風氣。因此，臺灣知識分子最初對傳統風俗舊慣的描寫，是基於提倡新文化以啓蒙民眾的社會責任，其立意是很明顯的，故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批判意識，也就相對強烈。而身為臺灣智識階層，又曾赴日接受現代文明洗禮的張文環，當然也繼承了臺灣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現實主義精神，從他早期涉及風俗描寫的幾篇小說中，我們亦可發現潛藏於作品內部的批判性格。

張文環將傳統風俗作為素材融入小說之中始於〈部落的元老〉，其後與漢民族文化相關的民俗舊慣書寫，似乎就成了張文環小說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不僅是其文學特色的主要標誌，亦為他博得了「臺灣風俗作家」的稱號。而在〈兩位新娘〉中，作者首先披露的便是傳統婚俗上的聘金制度。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先鋒張我軍，曾在〈聘金廢止的根本解決法〉一文中揭示聘金制度產生的根由：

在大家族主義底下的結婚簡直是女子的人身買賣。從男家說是「娶入」，從女家說是「嫁出」，這正如商品自甲之手賣入乙之手，不過易買賣為嫁娶罷了。男家的家長欲生兒育孫以傳家，不惜出幾百塊錢娶一個媳婦。這樣的兩家交易後的女子便為男家之從屬人了，一切事都不得不服從男家的指揮。女家呢？二十年（結婚年齡假定二十）的心血所養成的一個女子，一定不肯平白地送給他家為從屬人，為他家生兒育孫，所以受男家的所謂聘金寧可說是當然的。〔註4〕

〔註4〕張我軍：〈聘金廢止的根本解決法〉，原載《臺灣民報》3卷4號，1925年2月1日，收入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6月），頁91。

不論是男方送定的聘金，或是女方回禮的嫁妝，皆屬於婚俗儀式的重要一環，而聘金、嫁妝的多寡，也常被男女雙方及其親友拿來比較彼此家世和衡量社會地位的憑據。更有甚者，一些不肖的父母或較貧窮的家庭，竟把女兒的婚嫁當作是改善家庭經濟、謀取暴利或是籌措兒子將來娶媳費用的契機，故意把聘金提高，造成男方的困擾和壓力。所以，因聘金問題導致雙方爭執或不快，致使良緣告吹或為日後的婚姻生活埋下導火線的亦不乏聽聞。如小說之中，男女雙方就在嫁妝與聘金上相互角力與算計。女方以「現在是文明開化的時代」〔註5〕為藉口，認為嫁妝可以在街上買現成的，不必搬來搬去，一切從簡；但在聘金及訂婚禮餅上可就不能馬虎，一切須依女方的要求辦理。如此雙重標準，福伯了然於心：

這真是狡猾，福伯仔雖然這麼想，但是既然喜歡那個女孩子，稍為不合理也勉強答應了。(中略)嘴說文明開化，是很好聽，這種騙人的鄉下農民，福伯仔雖然覺得很不愉快，可是這也就是這個社會的風俗，不得不忍耐，福伯仔就答應了對方所有的要求。〔註6〕

然福伯的妥協卻沒有換來好的結果，那個先前觀察「像是明是非的女孩子」〔註7〕，讓他甘願用三百圓聘金、二百盒禮餅為代價娶回來的媳婦，竟會在婚後不久，即以不敬的話忤逆自己，這無疑與張我軍所云，花幾百塊就能使女子變成夫家順從者的說法大相逕庭。作者如此安排，讓媳婦挑戰公公的權威，亦等同挑戰了其背後所代表的封建傳統，是對被社會風俗視為理所當然，如金錢交易般，在聘金制度下締結之婚姻的無情嘲諷。

再者，小說對臺灣民眾以求神問卜來決事、解厄的迷信行為亦有所著墨。鄰人把福伯仔公媳不合的原因歸究到新娘出轎的時間與雙親的生辰相沖，而福伯仔除了認同鄰人的說法外，自己也把矛頭指向他與媳婦兩人的生辰相剋。因此福伯仔從善如流地接受眾人的建議，到卜卦師盲順那尋求解決之道。盲順在聽其來意後先是屈指一算，後又以籤占卜，得到的答案與福伯仔猜想的「不謀而合」——出轎時刻，自己與兒媳三人生辰相沖。至於解決辦法，盲順說：「嗯！很簡單，用小小的壺子，把三個人的生年月日放進去，並唸咒，唸完後再用真紅的布綁緊壺口，在三更時分，一個個埋在三叉路口。」

〔註5〕同註2，頁154。

〔註6〕同註2，頁154。

〔註7〕同註2，頁154。

〔註8〕但依計行事的福伯仔殊不知自己挖的是剛修繕完畢，且在州廳獲得褒揚的模範道路。故東窗事發後，福伯仔遂遭到警察掌摑與罰金的命運，可說是適得其反，自招禍端。而賺飽謝禮的盲順如果真有本事，又怎會棋差一著，落算一步，陷福伯仔於不義呢？作者不無藉此對福伯仔的愚昧和盲順之流的斂財術士諷刺一番。另外，通過福伯仔的行爲，作者也點出了當傳統風俗與現代律法／國家體制相抵觸時，前者仍須受後者規範——「說是爲了解除家庭災厄，警察怎會了解？那麼重要的馬路挖了個洞，也會受人責難的」〔註9〕——，頗有教化、啓蒙民眾的意味。

（二）見之於社會人心中的醜陋民性

吝嗇計較、貪小便宜、自視過高，皆是常見諸社會的不良風氣，或是根植於封建人心的醜陋習性。小說就描寫了福伯仔對酒席的開銷與賓客的賀禮斤斤計較的心理：

一桌坐八個人就要十二、三桌，那麼每個人平均包賀禮兩圓來，不然算起來會損失，負擔就大了。福伯仔立刻跑進房裡，翻開名簿，打一打算盤，這不行，每個人賀禮平均只有一圓二十錢左右而已。這樣子還要酒，那不行。〔註10〕

結婚宴客，本該以賓主盡歡、順利圓滿爲要務，至於賀禮則是主隨客意，並無硬性規定。若像福伯仔這樣把單純的喜宴複雜化，吝嗇計較，不肯吃虧，那無疑是自尋煩惱、自找罪受。不過再三考慮下，福伯仔還是花掉近千圓爲兒子辦了場熱鬧的婚宴。但這令人意外的熱鬧場面，背後卻藏著心照不宣的齷齪：

有一位老阿伯私下說，那不是阿福的面子大，而是因爲菜色和藝妲。你想想看，一圓就能吃到好菜色又能喝酒，加之還能聽到藝妲唱歌，像現在這種社會，誰會放過這樣的機會。（中略）現在已經跟我們年輕時代不一樣了。在那個時候，如果不是相當親密的友人或親戚，是不會送禮的。像那麼多人來了，阿福伯仔連客人的名字都記不起來吧！〔註11〕

〔註8〕同註2，頁158～159。

〔註9〕同註2，頁160。

〔註10〕同註2，頁154～155。

〔註11〕同註2，頁155。

作者藉由老人之口，揭示了一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虛偽矯情的社會，而生活其中的人，也已不復純樸，成爲寡廉鮮恥、貪小便宜的一群。

另外，於福伯仔再婚對象阿嬌的身上，反映的則是固執己見或說是自視過高的封建意識。傳統社會底下的男女婚配，講求的是「門當戶對」，這種不以愛情、德性而以家世、職業爲擇偶條件的守舊觀念，即便到了文明開化的今日，依然爲許多家庭所承襲、信仰著。阿嬌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是街上公學校第二或第三屆的畢業生，在那個教育不普及的保守年代裡，女人有公學校文憑是很稀罕的，尤其對出身鄉村的女人來說更屬難得，故自負地以醫生或訓導爲結婚對象，除此之外的男人絕不考慮。然她左挑右選的結果始終沒有達成心願，但年齡隨著歲月卻不斷增長。「醫生都要唸專門學校，公學校畢業生要嫁給醫生，是有點距離，但應該要堅持訓導，看到訓導穿的制服，閃亮的肩章與佩刀，她就心跳不已，那是判任官的階級啊。」〔註 12〕日據時期，因民族歧視及差別待遇，臺人子弟若想在社會上爭得一席之地，或冀望得到比較豐厚的收入，多半會以醫生、律師與學校訓導三種職業作爲努力目標，這亦是當時有心栽培子女的父母共通的期望，當然也被女方視爲婚配的理想對象。就阿嬌來說，她會以醫生、訓導作爲擇偶條件，貪圖的是階級上升的虛榮以及自以爲是的「門當戶對」。俗語道：「揀啊揀，揀著一個賣龍眼。」對於阿嬌一廂情願、糟蹋婚姻真諦的偏執觀念，作者顯然相當不以爲然，故意讓這個「想要嫁給醫生或訓導的女人，竟迷路跳進阿福伯的寢室來」〔註 13〕。張文環以十足詼諧諷刺的敘述文字，調侃了阿嬌最後的婚姻結局。

（三）結語

張文環通過一家二代，父子先後娶妻的鄉里趣聞，披露了陳腐的風俗陋習、描繪了醜陋的世相民性、嘲諷了愚昧的守舊思想，情節簡單，內容卻富有深意。再者，小說於人物形象上雖無太多著墨，但從作者對事物的巧妙比喻，仍可看出其豐富的想像力。如阿福伯早先厭惡石榴樹時，覺得它的花「像延誤了婚期的鄉下姑娘般，一點也沒有給人漂亮的感覺」；而其果實內部「就像惡魔露出了牙齒一樣，全都是種子而不好吃」，外觀則像「小而堅硬的少女乳房」〔註 14〕，生動且鮮明地形容出石榴花與果實的各個型態。

〔註 12〕 同註 2，頁 161。

〔註 13〕 同註 2，頁 162。

〔註 14〕 同註 2，頁 152、162。

〈兩位新娘〉可說是張文環文學歷程的一個重要分界點，承續其後的正是他首次嘗試的長篇創作《山茶花》。且他接下來所發表的短篇小說，於質於量同樣繳出傲人成績，佳作不斷，好評如潮，是他創作上的黃金時期，將張文環推上人生的第一座高峰。

二、《山茶花》

一九三六、三七年，維繫臺灣新文學運動命脈、凝聚島內外臺人作家的兩個重要文藝雜誌——《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相繼停刊。其後又受到殖民當局廢止漢文欄禁令及中日事變爆發的影響，使萌芽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的臺灣新文學之發展，陷入了萎靡和停滯的狀態。漢語作家被迫退場，日語作家也因事變的衝擊而失去心裡的從容與創作的餘裕；事變之前在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浸淫下的臺灣新文學性格，亦被高漲的軍國主義氣焰所壓抑。於是，在沒有活動空間和喪失發表園地的這一階段，臺人作家的苦悶可謂空前劇烈，故龍瑛宗遂以「文學之夜」〔註15〕來形容事變後至一九四〇年《文藝臺灣》創刊前長達兩年半的空白時代。可喜的是，臺人作家在內外交困的文學環境中，並未放棄創作，基於對文學的信念與熱情，他們在冷清的文學之夜留下了九篇小說，雖然成果不豐，卻對日後臺灣文壇的復甦產生相當程度的催化作用，對臺人作家士氣的提振也有莫大的激勵效果。而其中的關鍵人物，則是時任《臺灣新民報》學藝欄編輯、負責企劃「新銳中篇小說」的黃得時。他曾自云此企劃的緣起謂：

隨著事變長期繼續，眾人也逐漸恢復做文學的心情，加上被朝鮮以及滿洲蓬勃的進展所刺激，不期而遇地在眾人念頭浮現了臺灣的文學也必須有所發揮的想法。這就是《臺灣新民報》出現新銳中篇小說特輯的緣故。這特輯幾乎依靠我企劃做成，作品以翁鬧的〈有港口的街〉為首，有王昶雄的〈淡水河的漣漪〉，呂赫若的〈季節圖鑑〉，龍瑛宗的〈趙夫人的戲畫〉，陳垂映的〈鳳凰花〉，中山千惠的〈水鬼〉，張文環的〈山茶花〉等共九篇，在該報的學藝欄裡繼續前後刊登了八個多月。（中略）依靠這些作品，暫時萎縮中的文學熱情再度昂揚。〔註16〕

〔註15〕龍瑛宗著，林至潔譯：〈一段回憶——文運再起〉，原載《臺灣新民報》，1940年1月7日，收入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1月），第5冊，頁20。

〔註16〕黃得時著，葉石濤譯：〈輓近臺灣文學運動史〉，原載《臺灣文學》2卷4號，1942年10月19日，收入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第3冊，頁394。

《臺灣新民報》的「新銳中篇小說」企劃，無疑是點亮臺灣文學之夜的星火，張文環有幸能參與其中，對他個人的創作生涯或是臺灣新文學的繼承與復興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且深遠的意義。

（一）《山茶花》的誕生與意義

攤開張文環的創作年表，可發現自一九三三年以〈落蕾〉為處女作開啓文學生涯以來，至《山茶花》連載之前，其所發表的作品皆是短篇，且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中，也未見張文環有創作長篇小說的念頭。而《山茶花》之後迄終戰為止，亦不復有第二部長篇刊行，迨再見之時，已是相隔三十五年，由東京現代文化社所出版的《爬在地上的人》。換句話說，《山茶花》不僅是張文環首次嘗試的長篇之作，也是日據時期唯一寫下的長篇小說，而這樣的文學現象，是時代環境影響下的偶然，抑或作家創作歷程上的必然呢？筆者認為二者兼具吧！

一九三八年，張文環偕妻回臺後隨即北上謀職，由於經濟不穩定加上臺灣文壇的丕變，讓他創作量頓時銳減，除了為任職的《風月報》日文版寫「編輯後記」外，便是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一些隨筆、雜文及評論性質的文章。《山茶花》連載前唯一一篇小說創作，是該年十月，刊登於《風月報》上的〈兩位新娘〉，此後約莫一年三個月的時間再無創作。那麼，究竟是何原因觸動其創作神經，讓他在沉寂之後即以長篇之作面世呢？關於這個問題，李師進益認為與張文環翻譯徐坤泉《可愛的仇人》一書密不可分：

翻譯，在某一個意義上，是一種再創作，尤其是張文環所譯《可愛的仇人》，已接近實質的創作層次，因此，翻譯長篇小說這一次具體創作的實踐，對張文環往後寫作長篇《山茶花》所起的巨大影響，自是不言而喻。（註17）

因劉捷的商請，甫從日本回臺的張文環在尚未讀過原著的情況下，便接下了將徐坤泉的漢文長篇小說《可愛的仇人》翻譯成日文的工作。而這樣的機緣，自有其相應的時代背景。原著《可愛的仇人》從一九三五年起，在《臺灣新民報》連載了一百六十回，翌年二月二十四日，由臺灣新民報社出版單行本。因連載期間廣受讀者歡迎，所以單行本出刊後亦造成熱賣，遂有改拍成電影的計畫，但在此之前，希望能先將其日文譯出發行單行本。之所以如此大費

（註17）李進益：〈張文環《山茶花》創作前後的相關問題〉，《通識教育年刊》第2期（2004年12月），頁243。